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 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 CSSCI 来源期刊
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

经济评论

简 报

2013 年第 5 期

《经济评论》编辑部

2013 年 9 月 16 日

编者按

1. 惩罚预期、投诉成本与多级质量均衡.....王洁
2. 寡头垄断厂商技术创新动力：价格竞争还是产量竞争.....王必好 黄浩洁
3. 何以立德：对“嫌贫爱富”现象的经济解释.....王学龙 马晓逵
4. 高房价为什么没有抑制城市人口的增加？.....谭锐
5. 城乡统筹理论的微观基础.....刘维奇 韩媛媛
6. 宅基地流转中的主体行为分析——兼论农民利益保护.....孙秋鹏
7. 进入壁垒一定会阻碍企业创新吗？.....叶林 曾国安
8. 制造业产业升级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田洪川 石美遐
9. 城市群内部“积极竞争”与“消极合作”行为分析.....赵曦 司林杰
10. 传统方法测度的环境技术效率低估了环境治理效率？.....涂正革 谌仁俊
11. 环境规制是否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李强
12. 社会资本对中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的影响.....马宏 汪洪波
13. 非线性利率规则和中国经济波动.....郭宁
14. 为什么消费者对同一种货币政策有不同的反应？.....柳阳
15. 场外衍生品业务对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不容忽视.....斯文
16. 演化经济学还是异端经济学吗？.....于斌斌
17. 小企业贷款难的“愁”与“解”.....黄宪 曾冉
18. 货币政策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评述.....廉永辉 张琳

《经济评论》简介

编者按

理论一旦为社会大众所掌握，就能焕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为充分发挥经济学研究在经世致用、咨政育人、服务实践方面的功能，以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影响社会精英、影响社会民众，我们决定面向大众传媒，编辑出版《经济评论》简报。

大体而言，经济类文章不外乎三种类型：(1)运用经济学的前沿理论和方法，以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从事经济学专业研究的同行阅读的文章，目的在于探索和研究社会经济；(2)运用经济学理论，以非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决策者看的文章，目的在于通过影响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思维而改造社会经济；(3)运用经济学知识，以非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社会大众阅读的文章，目的在于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经济生活。《经济评论》简报就是要把第一类（学术论文）转化、简写为第二、第三类文章。凡在《经济评论》上刊发的论文，均由作者改写成1000—1500字的简写稿，以非专业方式表达作者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学术洞察与学术思想。

简报文章以原文为基础而改写，兼顾现实性、学术性和可读性。虽是改写，但我们要求文章自成一体，力求以生动的笔调、浅显的案例娓娓道出作者的学术思想，让非专业读者了解社会经济现象，帮助他们思考经济问题，进而获得思想启迪。因此，简报语言平实生动，说理深入浅出，文章简洁明快，尽量避免专业性很强的理论概念、数理模型及其推演、数据表格、专业注释等。阐述观点、研究结论或提出政策建议时，没有罗列大量数据，但有关键的数据或事实支撑。

学术期刊研究成果的社会化、大众化和通俗化是理论服务实践的一项积极探索。我们相信，经过学界同仁的辛勤耕耘，《经济评论》简报将成为一个雅俗共赏的精神园地：既有学术的严谨性、又有表述的生动性，既有理论的逻辑力量、又有实践的事实力量，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现实的感染力，从而使《经济评论》在注重学术品位、不断提升学术水准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学术成果的社会影响，更广泛地服务社会经济建设、服务社会精英和人民大众。

《经济评论》编辑部

经济理论探索

1. 惩罚预期、投诉成本与多级质量均衡

王洁 (华南师范大学), 《经济评论》2013 年第 5 期

近年来质量事件时有发生,这其中既有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有大众民生性食品工程(刘呈庆等,2009),既包括欧、美、日品牌,也包括中国本土企业。剔除质量事件中的国别、项目类型等特异性因素,可以发现,这些质量事件中大部分产品的生产过程经历了不同供应链主体,服务项目也存在多级外包现象,使多级委托-代理成为事件发生的共同结构背景。而由于不同层级之间各参与主体信息不对称(龙小海等,2009;周业安、宋紫峰,2011),委托-代理属性是质量事件发生的潜在原因。然而,在信息不对称的多级委托-代理环境中,供应链质量事件产生的根源何在?何种机制能在多级委托-代理环境下有效提高产品与服务的质量?学者们的前期研究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

传统的供应链质量激励机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包括抽样检查、事后奖惩及第三方参与等。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是质量抽样检查机制,但该方式由于具有破坏性检验成本高、中间环节较多、抽样机构存在被寻租风险等缺陷而存在操作上的局限性(王洁,2010)。而事后奖惩克服了抽样检查机制的局限,具有涉及环节更少、操作更简单等优点,但其具有“事后性”弊端,如果简单地运用到重大工程项目和基础性民生产品中,一旦产生质量问题,虽然可以通过奖惩进行事后追责,但其所产生的巨大的人民生命安全危害和重大的社会物质财富损失已不可弥补,因而存在运用上的局限。

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笔者构建了基于强惩罚预期的多级供应链质量激励机制,该机制具有以下特点:(1)现有文献主要研究两级供应链质量激励(Zimmer,2002;Schneeweiss and Zimmer,2004;Chao, et al,2009),而笔者将研究扩展到由消费者、零售商和供应商构成的三级供应链,通过引入实际感知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消费者,并由消费者在遭遇不合格产品及服务时发出投诉,触发零售商对供应商进行违约惩罚,构建多级委托-代理环境下的质量激励机制,使研究更具现实针对性。(2)与基于奖惩的质量激励文献的“事后性”特点不同(Zimmer,2002;Schneeweiss and Zimmer,2004),笔者通过设置强惩罚系数在供应商的激励相容约束中,使作为代理人的供应商期望收益与作为委托人的消费者利益相协调,避免了代理人投机问题,并且通过设置对投诉消费者的补偿,使消费者有激励及时投诉,从而将投诉变成一种“Tick for Tack”机制,而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委托者供应商,在“Tick for Tack”策略下,必然在质量投入阶段就理性地将质量保持在契约协定水平之上,以避免必然的强违约惩罚。因此,本文设置的实际上是一种“事前信号”,即以强惩罚威胁提前遏制代理人的投机动机,从而避免了奖惩机制的“事后性”缺陷。

通过建立多阶动态博弈模型,运用仿真与模拟分析,结论可以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1)

当提供不合格产品或服务不遭受额外惩罚，而只需退换不合格品时，理性的供应商一定只会提供低质量的产品或服务，而不论其原本类型属于“低质量”或“高质量”，导致市场上“劣质驱逐良质”的“逆向选择”结果，最终整个市场上充斥着低质产品。(2) 强惩罚预期机制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方式。该机制下，只需在契约中规定供应商提供不合格产品或服务将遭受“极强惩罚”，则所有供应商都将自觉提供质量合格的产品或服务，整个市场上的不合格品消失。(3) 由于强惩罚预期机制是通过实际使用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投诉来解决质量信息在供应商、零售商和消费者之间的不对称问题，并且通过投诉引致对供应商的惩罚，因此鼓励遭遇不合格品的消费者进行投诉是机制成功的关键。为此，笔者在对不合格供应商进行惩罚所获得的违约金中设置了对投诉消费者的补偿，但更重要的是，该机制的成功实施需要整个商业社会营造出较好的环境氛围，包括降低消费者投诉成本，严格惩罚制假售假，鼓励乃至奖励投诉消费者的积极性等。

2.寡头垄断厂商技术创新动力：价格竞争还是产量竞争

王必好（南京大学）、黄浩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寡头垄断市场结构的技术创新效应研究》，《经济评论》2013年第5期

现实经济生活中，价格战硝烟总是由寡头垄断行业中一些厂商挑起的，采取低价策略占领更多市场份额。价格战给消费者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也为厂商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积累“本钱”，经营将会略胜一筹。而有些寡头垄断厂商则倾向于产量竞争，外延扩大再生产能快速增加产量，依靠规模优势迫使其竞争对手退出市场。基于技术创新角度研究发现，不同竞争策略将会引起技术创新要素投入强度各有差异。

以煤炭开采洗选业、汽车产业为例，两个行业均由少数厂商控制，对市场价格具有一定控制能力，行业进入壁垒较高，每个厂商产量在行业中占有较大比重，产品有差别。煤炭开采洗选业各厂商价格悬殊不大，同种商品批量持续交易使价格变化逐渐趋向一致，只能围绕产量进行竞争，价格小幅波动难以激励厂商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在产量竞争作用下，煤炭开采洗选业技术创新活动不是遵循一般技术升级路径，即由简单技术模仿到辅助性技术创新、再进行核心技术创新，而是以核心技术为导向带动重大装备设施技术创新，扩大规模，进行大批量生产。汽车市场以价格竞争为主，行业技术寿命周期短，产品升级换代快，产品功效、外观设计、款式、性能和配置等不断变化，大规模生产容易导致产品淘汰滞销，厂商提高技术经济效率走集约经营之路。

上述案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寡头垄断厂商价格和产量竞争对技术创新投入产生迥然不同的效应。寡头垄断厂商通过价格竞争实现伯特兰均衡，比通过产量竞争实现古诺均衡更加有利于扩大技术创新投入，而且寡头垄断厂商在伯特兰均衡中通过跳跃法技术创新比分步法技术创新获得更多利润。

利润最大化是每个厂商的追求目标，寡头垄断厂商也不例外。价格战最终会导致价格下跌，直接减少厂商收益，长期降价使厂商难以持续经营。厂商一旦提高价格将会失去整个市

场，低价厂商将会吸引全部购买者。寡头垄断厂商只有依靠技术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提供具有差异化功能的产品，促使需求价格缺乏弹性向富有弹性转变，为消费者带来更多价廉物美的商品。因此，当生产能力不能无限扩张时，技术创新成为寡头垄断厂商获得超额利润的主要来源。

产量作为决策变量，厂商将直接以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为目标，外延扩大再生产只能使厂商获得微薄的加工制造收入，而且占用了大量技术革新、改造资金，产品附加值得不到大幅度增长，技术创新动力受到严重削弱。

以技术创新为导向的价格战，不会减少寡头垄断厂商利润，而且可以充分保证技术创新投入。一个寡头垄断厂商供给能力难以完全满足全部市场需求，另一个厂商将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寡头垄断厂商在竞相降价时，将会权衡降价短期收益与价格战长期损失，为避免价格战造成两败俱伤，寡头垄断厂商相互勾结，在 $p_1 = p_2 > MC$ 时达成价格协议，形成同盟追求超额利润。寡头垄断厂商试图加快技术创新，提高产品差异化程度，优化服务，扩大市场势力，保证价格长期高于边际成本。

这样，寡头垄断厂商需要确定技术创新要素投入的合理水平。由边际理论可知，厂商最优技术创新要素投入水平是，增加一单位技术创新要素投入的边际成本等于由此带来的边际收益。当投入一单位技术创新要素获得的收益增量大于边际成本时，厂商会继续加大技术创新要素投入，反之，则会减少技术创新要素投入。技术创新要素投入不同于其他要素投入，厂商既可以进行自主创新，也可以开展技术模仿，分享竞争对手技术创新的外溢效应，节省技术创新要素投入成本。因此，寡头垄断厂商之间价格竞争将会激励技术创新要素投入竞争。

中国经济研究

3. 何以立德：对“嫌贫爱富”现象的经济解释

王学龙（北海道大学）、马晓逵（中国人民大学），《经济评论》2013 年第 5 期

我国当前面临着严重的道德滑坡问题，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嫌贫爱富”愈演愈烈。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必然有其深层原因。社会中大多数人在未来都可能遇到各种机会，这个机会可能是获利前景很好的创业机会，可能是更好的投资项目，也可能是更好的工作机遇。为了把握住这些机会，参与者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例如，开店需要启动资金，投资楼市需要足够的资金。这些机会对于各个参与者都是随机的。为了更好的把握住将来可能到来的机会，每个人都希望最大化自己的“资本实力”，以便在机会来临时可以摆脱资本约束。如果金融市场不发达，人们必须依靠亲戚朋友获得资金支持，从而把握住机会。那么，人们就会为了提高自己动用资金的能力而构建自己的社会关系。构建和维持人际关系需要付出成本。因此，每个人必须在一定的预算约束下合理分配维持关系的资源，从而构建一个最有效的关系网络。在资本实力最大化动机驱动下，“嫌贫爱富”就成为一个理性的选择。

这个逻辑可以解释转型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道德滑坡问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人们对未来的预期非常稳定，将来的机会和选择不像市场经济条件下那么多，也就不会过分采用“嫌贫爱富”的策略。在发达市场经济中，人们虽然面对更多的机会，但可以通过金融机构获得资金支持，不需要严重依赖私人关系网络。因此，人们也不会过分“嫌贫爱富”。恰恰是在转型社会中，人们开始面对未来的各种机会和可能性，但又无法从正规的金融机构获得支持。此时，人们只能严重依赖于私人关系网络。这就是转型社会道德滑坡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意味着要想解决“嫌贫爱富”的问题，需要健全金融市场体系，完善商业网络。如果人们可以通过发达的商业网络更便捷地获取资金支持，从而减少对私人关系的依赖，就可以使“嫌贫爱富”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

真实世界的经济也可以为这个理论分析提供佐证。比如，在金融系统很成熟的发达国家，人情就显得很淡泊。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在于送礼行为上。当前很多中国人对礼物的要求很高，似乎价值不高的礼物不能有效维持人际关系。其实不只是中国人，很多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而在经济较为发达的社会，人们对礼品的价值并不十分在意，礼物太重反倒会给对方造成压力。这种价值观的差异非常关键。因为人的意识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这种价值判断的差异背后乃是“经济基础”的差异。我们认为，人们对于礼物的看法差异体现了对私人关系网络的依赖，反映了金融系统发展程度的差异。发达国家的金融系统很成熟，个人比较容易从金融体系获得资金支持，所以人们对私人关系的依赖程度较低。因此，在发达国家，人情不像在发展中国家那么重要，礼物的价值也就不像在发展中国

家那么重要。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恰恰相反：因为人情很重要，所以礼品很重要，所以礼品必须要“重”。

现实社会中存在很多商业网络替代私人网络的经济现象。银行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另外，邮政系统的出现也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在邮政系统不发达的时候，人们传递信件需要依靠朋友和邻居。一个村子里面的乡亲互相帮忙。一个村民外出办事情（比如采购货物、参加婚礼或葬礼等）经常要为其他人传递信件，就是“捎信”。但这个私人网络的效率很低。首先，村民外出的频率不稳定；其次，请求别人“捎信”的人需要以礼物的形式维持与“捎信人”的关系。邮政系统的出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第一，商业系统比私人系统的功能稳定。只要村民有寄信的需求，就可以得到满足。第二，通过邮政系统寄一封信的成本要比托人“捎信”低。因此，邮政系统以绝对的优势在与私人系统的竞争中胜出，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先后出现了形式不同的邮政系统。从理论分析以及这些案例来看，商业网络替代私人关系网络，从而减轻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似乎就是一个历史的趋势。

4.高房价为什么没有抑制城市人口的增加？

谭锐（中山大学）

《住房投资性需求与中国城市规模扩张——基于空间均衡模型的分析》，《经济评论》2013年第5期

新世纪头十余年，中国大中城市有两个并存的现象值得注意，一是房价持续飙升，二是城市人口规模（以下简称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按照城市理论的看法，住房成本是一种驱散力，高房价会令打算在城市定居的劳动者望而却步，从而起到抑制城市规模扩张的作用。然而，伴随着房价高涨，现实中的城市规模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持续扩大。以中国35个大中城市为例，它们平均的年末非农业人口由2001年的233万扩大到2011年的425万，11年间扩大了将近2倍。为什么高房价没有抑制城市规模呢？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笔者选择住房市场需求面因素作为切入点，解释其中的机制。

房价由市场的供求力量决定。从需求面来看，存在两种类型的需求，一个是自住需求，一个是投资需求。大中城市的就业机会吸引劳动者不断地进入，他们的自住需求会推高房价。与此同时，住房又是一种投资品，投资者持有房产伺机套利，这种需求的增加同样推高了房价。相对于自住需求，投资需求量可以迅速增减，所以它对房价的影响更大。住房投资行为有两种同时存在的效应，一是直接效应，即它的出现增加了住房市场的需求量，推高了房价；另一个则是间接效应。投资需求的增加使房地产业繁荣，城市政府可以从中获得许多与土地相关的收益，包括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业税费。这就是政府的土地财政。这些巨额土地收入在官员造政绩、求晋升的动机下都转换成了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其中交通设施建设是重中之重。城市交通设施的改善，使得劳动者在面对高房价时除了选择迁移到别的城市外，还多了一种选择：住到离市中心较远的地方去。这样就可以回避高房价，同时进城也是很方便的。

简而言之，投资行为通过这条间接路径改善了城市的通勤成本，削弱了高房价所产生的驱散力。这条间接路径是理解现实的关键之处。

为进行正式的经济分析，笔者构建了一个虚拟的城市。这个城市模型的最大特点就是里边存在住房投资者，他们不住在城市里，所以既不影响生产也不影响消费，他们的直接影响就是把劳动者排挤到离市中心更远的地方，从而让他们承担更高的通勤成本。这个模型区别于传统模型的地方在于，它体现了住房投资性需求的存在。

经济学的数理模型总在真实性与可处理性之间做出权衡，模型越逼近现实，处理的难度越大。我们无法得到城市均衡规模以及其他重要变量的解析解，为了获取结果，使用了数值模拟方法。模拟结果显示，虚拟城市的人口规模、交通设施水平、房价都随着住房投资量的膨胀而增加，城市的地理边界也在不断地向外扩张，这表明，城市的确在以扩张地理范围的方式增加城市容量。所有这些结果都是同时从这个虚拟的城市中得到的，与我们在现实中观察到的现象高度吻合，这说明笔者所阐述的机制不仅反映现实，同时也是符合城市理论的逻辑。

最后，我们发现住房投资、土地财政和城市建设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从中得到的现实启示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住房投资并非百害而无一利，它解决了城市建设的资金问题；第二，住房投资行为直接关系到城市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抑制投资性需求、压低房价的政策与城市政府的利益不相容，这就是为什么屡次中央调控收效甚微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三，“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要求城市用地不断向外扩张，其结果是引致许多额外的成本，如土地利用效率下降、农田遭侵蚀威胁粮食安全、引发社会利益群体的对立和冲突等。

5. 城乡统筹理论的微观基础

刘维奇（山西财经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韩媛媛（中国人民大学）

《城乡统筹视角下的农民经济模型研究》，《经济评论》2013年第5期

由于农民收入增长乏力，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关键，所以，如何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成为各界关注的重点，国家也出台了很多惠农政策和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措施，但收效不是太明显。同时，学术界对城乡统筹理论的研究和探讨也不断深入，城乡统筹理论的完善需要其微观基础，也就是从农民本身的行为动机进行研究，而很多研究都是停留在表面的宏观框架的分析上，同时，也只有弄明白农民的行动机理，才能制定出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有效措施。

现在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程度虽然远远落后于城市，但是，却不再处于一种完全封闭的状态，而是处于了一种开放经济环境下，这就需要深刻理解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农民消费与生产行为，构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农民经济模型，为整个城乡统筹理论构建微观基础。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村经济与强大的城市经济比较，类似与一个开放性的小国家，资本收益率是外生的，它不能自己决定其收益率，而是取决于强大的城市经济所决定的资产收益率。

从消费方面来讲,对于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农村家庭来说,家庭获得收入的途径有三条,一是去企业工作获得工资,一般从事多是非农产业,另一条途径是家庭经营获得纯收入,家庭经营一般以家庭农场经营为主,也存在一定的非农产业经营,家庭非农经营占比比较低,还有一条途径就是资产的利息收入。虽然农户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与一般消费者不同,但所达到的消费者均衡选择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资产收益率不再是农村经济系统所决定的了,而成为一个外生给定的值。农民的消费欲望并不弱,或者说其消费倾向并不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城镇的消费方式会对农村消费产生比较强的示范效应,但是,由于农民收入水平的限制,农民的消费意愿很难得到满足,当下重要的不是诱导农民消费,而是应该想办法增加农民收入。

对于以小农生产为主的农村家庭来说,涉及到生产的有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生产,农户有一部分成员去企业工作获得工资收入,再一个方面是农户的家庭经营生产,这两种生产所经营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对于农村企业来说,它与城镇厂商或者说一般厂商的本质区别是,它所面对的资本收益率不再是自身所决定的了,而是在固定资本收益率下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而要达到利润最大化必须根据资本总量来确定雇佣劳动数量。对于家庭经营来说,却不是这样,首先,农村家庭经营的首要目标不再是利润最大化,它是在农村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吸收一定农村劳动力的情况下,使剩下的农村劳动力实现自我就业;其次,家庭经营具有相对高的稳定性,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在企业工作的成员可以退回到家庭经营,以规避风险;最后,家庭经营还承担一定社会保障的功能。所以,农民可以接受一个比较低的家庭经营收入,但是,当家庭经营的人均纯收入低到一定程度,农村劳动力可能被迫选择进入城镇,劳动力的转移又是有成本的,如果人均转移成本高于农村人均资本,对农村的发展是不利的。

有效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有三个,一个是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增加农村企业的投资,加快农村企业的资本积累,吸收农村劳动力;二是降低城乡人口转移成本,发挥城市化对于提高农民家庭经营人均纯收入的作用;三是提供保障,鼓励农户兼业经营,增加在家庭经营中非农产业的比重。当然,降低企业的资本收益率和提高农村家庭经营的技术水平从长远来看也是有效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

6. 宅基地流转中的主体行为分析——兼论农民利益保护

孙秋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评论》2013年第5期

宅基地是农村的农户或个人用于住宅基地而占有、利用本集体所有的土地。农户宅基地不能用于商业用途,也不能转让给城市居民,如果要转让宅基地,原则上只能在本集体经济范围内流转。宅基地要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必须经过地方政府征收环节。

近些年,全国范围的土地价格快速上涨,城市土地紧张的问题越发突出。中央政府为了防止城市建设用地扩张过程中发生农用地大规模减少,危及粮食安全的情况,严格限制地方政府的农用地占用行为。地方政府要增加城市建设用地只能采取征收农村宅基地等农村建

设用地的方式。目前在宅基地征收过程中，引发比较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是，农户获得的补偿价格很低，地方政府将征收宅基地土地转让后获得巨额收益，农户抵制地方政府征收的情况较为普遍，并经常出现农户和地方政府人员冲突甚至是引发严重的群体事件。

是什么原因造成农户在宅基地征收谈判中处于劣势地位，是什么原因造成农户只能获得较低的补偿价格呢，是什么原因造成征收宅基地过程中频频出现地方政府与农户之间的冲突事件？主要是因为我国的宅基地管理制度和土地征收制度赋予了地方政府宅基地垄断征收权。农村宅基地一旦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会出现几倍甚至十几倍的价值上涨，但是因为限制了宅基地的交易范围，宅基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只能通过地方政府征收的方式，地方政府就会利用垄断地位占有土地升值中的绝大部分。农户可以通过抵制方式来提升谈判能力，但是这要面临地方政府较为严厉的惩罚。地方政府掌握行政权力，可以动用行政部门来强迫农户接受政府的出价。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城市土地一级市场上也处于垄断供给者的地位，为了获得垄断利益，就会减少土地供给，这样就更压低了农户获得的补偿价格。

有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在地方政府违法征地，不按照国家规定标准给予农户补偿的情况下，农户的利益才会受到侵害。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即使在地方政府合法征收农户宅基地的情况下，农户获得的补偿也会很低。关于征收宅基地的补偿标准，基本上参照耕地补偿标准。2004年《土地管理法》中规定耕地补偿标准不能超过每亩年产值的30倍，按每亩平均年产值2000元计算，预计一亩耕地的征收费用最多为6万元，显然这个标准很低。

地方政府通过垄断权力征收的宅基地，并不能被有效利用。表现为两个方面：通过垄断供给的方式提供住宅、商业等房地产开发，造成土地供给不足，致使住宅、商业等房产价格处于较高水平；地方政府主要官员为了获得政绩，通过低价或者零地价提供工业等生产用地增加招商引资规模，造成工业用地供给过多和浪费严重。

为什么我国实行市场经济改革已经有二十多年，而包括宅基地在内的农村土地制度仍然没有大的突破，地方政府仍然掌握着农村宅基地垄断征收权？主要是因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维护现有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方面具有利益一致性。保证了地方政府宅基地等农村建设用地垄断征收权，就为在防止农用地被占用的情况下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增量土地来源，同时也保证了地方政府能够获得较高的财政收入，也就能使中央政府将很多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支出、城市建设支出等转移给地方政府。

要改变宅基地征收中农户利益被剥夺、被征收土地低效使用的情况，需要在城乡土地制度方面做大改革，动大手术。要彻底废除地方政府对农村宅基地等建设用地的垄断征收权，打破宅基地等农村建设土地进入城市建设用地市场的限制，使宅基地拥有与城市住宅相同的权利，可以自由转让；要将地方政府的征地范围严格限制在公益性领域，并按照市场价格支付补偿；以税收的方式来明确政府参与土地增值分配的比例，并要与政府参与其他类财产增值分配的比例大致相同。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农户的经济利益，才能有利于增加城市建设土地供给，提高土地配置和使用效率，并起到平抑和降低城市住宅、商业等房产价格水平的作用，

最终有利于更好、更快地推进我国城镇化建设。

7. 进入壁垒一定会阻碍企业创新吗？

叶林 曾国安（武汉大学）

《进入壁垒、策略性阻止与企业创新》，《经济评论》2013年第5期

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企业不仅要面对已有企业间的竞争，还面对潜在进入企业的潜在竞争压力。但潜在进入企业要想进入目标市场并分享利润，需要支付额外进入成本以越过目标市场已经形成的进入壁垒。进入壁垒可能来自规模经济、最小资本需求、沉没成本或形成产品差异化的创新和广告投入，也可能来自非市场行为的法律和行政限制。由于新进入企业需要支付这一成本才能进入该市场，因此进入壁垒似乎会降低竞争并导致社会福利损失。但考虑到企业创新问题，一定程度的进入壁垒未必完全是坏事，因为适度进入壁垒可以促使企业通过增加创新投入阻止潜在进入企业进入，其产生的福利未必低于垄断造成的损失。上述机制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博弈案例来分析。

设想某个产品市场中有已存在企业 A，另有一家企业 B 试图进入市场分享利润。A 必然不乐意有人进来争夺胜利果实，“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进而千方百计地采取各种手段地阻止 B 进入该市场。在这场阻止进入的战斗中，A 可以倚仗的武器有两个：一是天然进入屏障——进入壁垒的存在，B 要进入该市场需要额外支付的进入成本；二是 A 的主动防御，如 A 可以通过创新投入提高产量降低价格，使 B 进入分享的利润低于进入成本而放弃进入。由于创新也有成本，A 也会权衡创新投入与 B 进入造成的利润损失之间的大小，如果创新成本高于利润损失，A 将容忍 B 进入分享利润而不创新。由于上述权衡都取决于进入壁垒高度，可分为三种情况：

(1) 进入壁垒足够高。B 的进入成本大于利润，B 不会进入，A 也没有动力创新。结果是 B 不进入 A 也不创新，A 在原有技术水平下继续垄断市场；

(2) 进入壁垒足够低。B 进入成本很低，A 需要投入高于 B 进入造成利润损失的创新成本才能阻止 B 进入，A 因此放弃创新。结果是 B 进入 A 不创新，A 和 B 在原有技术水平下分享市场利润，没有技术进步但降低垄断程度；

(3) 进入壁垒适中。由于壁垒高度合适，A 通过创新投入使得 B 进入市场无利可图但又不至于创新成本过高。B 选择不进入，A 增加创新投入威胁 B。结果是 B 不进入 A 创新，创新水平提高。

哪种情况能最大程度增加社会福利呢？可以尝试排个序：首先，高市场壁垒同时阻碍竞争和创新，显然最不好；其次，低市场壁垒促进市场竞争但降低企业创新动力，其福利增加也有限；最后，中等程度壁垒阻止企业进入但促进创新投入，如果考虑到技术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中等程度壁垒将带来持续的福利改善。由于中等壁垒高度可以通过适度竞争促进技术水平提高（这一壁垒高度按照最小有效规模计算大约在 4%~12% 左右），因此

创新环境良好的国家其行业壁垒分布一般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

中国的行业壁垒高度分布却为“金字塔”结构，全部 482 个细分行业中，2/3 的行业进入壁垒都低于 4%（大部分低于 2%）；超过 6% 的行业壁垒高度超过 12%；不到 30% 行业进入壁垒在 4%~12% 之间。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的数据显示，大量低壁垒行业和少量高壁垒行业的平均创新投入远低于中等壁垒高度行业的创新投入，再次印证中等壁垒高度最有利于创新。顺便提一句，有意思的是，中国行业的利润率分布没有与进入壁垒及创新一一对应：虽然低壁垒行业同时表现为低创新投入和低利润率，但利润率最高的行业却来自高壁垒行业。这些高壁垒行业的创新投入不高，但利润率却非常高。其共同特征是：国有企业比重大、企业数量少、多年没有新企业进入，且多属于政策准入型行业。可见这些行业的高利润主要来自高壁垒导致的垄断地位。由于高市场壁垒尤其是非市场行为导致的高壁垒既阻碍竞争也阻碍创新，中国未来改革的重点是降低这些行业的人为进入壁垒。

8. 制造业产业升级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

田洪川 石美遐（北京交通大学）

《制造业产业升级对我国就业数量的影响研究》，《经济评论》2013 年第 5 期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的今天，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工业化逻辑起点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方式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近年来，部分沿海地区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工资成本上升等问题，反映出劳动力低成本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产业结构的转变将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对于中国而言，调整结构、改变以增加要素投入和物质消耗为条件的增长方式则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加大了基于产业层面的宏观调控力度，推动产业升级被列为“十二五”规划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成为当下中国经济发展最为鲜明的旗帜。如何在确保充分就业的前提下，推动产业升级，并以此实现宏观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是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议题，也是中国经济学科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

一直以来，中国产业升级始终面临着能否确保就业稳定的担忧和劳动力素质提升的限制。产业升级受到了“刚性就业机制”所造成的劳动力替代资本和技术等要素所形成的总量性制约，同时，产业升级也受到了纯熟劳动力和技术工人缺失的结构性制约，以劳动力数量、结构和质量共同构成了劳动力市场上产业升级的制约因素，直接影响着产业升级的速度和结果。然而，更重要的是，中国就业的变化将受到产业升级的影响，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将成为中国经济长期面临的问题。劳动力市场中长期存在的就业难题，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以劳动力素质为表现的供求结构性矛盾，在产业升级过程中这一矛盾将会更加突出。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表明，产业结构演进将引起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就业比重的依次提高，深层次的问题是，产业升级势必会带来资本技术对劳动力的节约，我国是否会出现大规模的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又如何以最小的失业代价完成产业升级？随着产业升级的不断深化，产业升级

过程中的技术更新和工艺进步需吸纳一部分素质较高的劳动者,能否定性定量地评估产业升级对劳动力就业的增加和减少效应,以及带来的劳动力在地区间和产业间的流动,并以此来归纳产业升级对劳动力市场的整体影响机制?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制造业产业升级将对我国劳动密集型发展模式带来深刻影响,如何评估制造业产业结构变动和价值链升级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效果,劳动力市场会发生怎样的变革?

这些相互交织的问题反映出,产业升级与就业促进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产业升级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效果并不明朗。随着中国产业升级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产业升级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将越来越凸显,可能出现的劳动力市场变动将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而中国现有对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中,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重供给、轻需求”,重结构、轻效率的研究倾向,缺乏基于从宏观到微观,特别是基于价值链效率方面产业升级对劳动力就业的研究。国内学者对产业升级对就业影响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角度进行,更多地体现在三次产业演进规律在中国的实证研究方面,这些宏观研究虽然能从一定程度上描述产业发展与就业增加之间的偏离,但却无法全面描述产业升级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机制和影响效果。以制造业为特定研究对象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入分析产业升级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机制、定量评估影响效果,也可以为缓解中国长期存在的就业压力、促进产业升级、逐步推动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新的思路。

9.城市群内部“积极竞争”与“消极合作”行为分析

赵曦 司林杰(西南财经大学),《经济评论》2013年第5期

区域竞争与合作是人们讨论和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的永恒话题。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中国城市群以占全国20%多的面积,集中了全国近50%的总人口,完成了大约70%的固定资产投资、80%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0%的经济总量……,说明城市群和都市圈已经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主体。目前我国现有的制度安排,如财政分权、政治晋升等,一方面促进了地方政府推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的强化了城市群内部之间的竞争,特别是城市群核心城市之间的竞争更是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如北京与天津、广州与深圳、成都与重庆、上海与南京和杭州等。

近年来,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协调区域发展、加强区域合作的呼声日渐高涨,“环渤海区域合作市长联席会”、“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泛珠三角9+2”等大量区域合作与协调组织相继成立。部分学者指出,随着区域经济协调组织的出现,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城市群将有效地开展区域合作,协调地方之间利益冲突。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现阶段我国几个主要城市群仍然存在着“消极合作,积极竞争”的现象,同一城市群内的城市对于那些双赢的区域合作机会反应冷淡(周黎安,2004),但对于某些竞争性的项目却异常积极,主要表现在各城市经常利用种种优惠措施招商引资,以邻为壑,发展自身经济(陈钊等,2011),有些核心城市之间甚至可以用全方位竞争来形容。为

什么城市群或经济区内部普遍存在“积极竞争，消极合作”现象？为什么上述协调机构不能实现其成立初衷？

我们以扩展后的城市群内部两中心晋升博弈模型为分析方法，力图解释城市群内部存在的“积极竞争，消极合作”现象，并利用四大城市群中北京等 8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通过理论研究，我们发现当城市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时，随着竞争行为对双方经济增长作用的增强，双方的努力程度不断提高；但当城市之间存在合作关系时，随着合作行为对双方经济增长作用的增强，合作双方愿意为之付出的努力反而降低，即所谓的“积极竞争，消极合作”。随后我们利用北京等 8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选取区域专业化水平、城市间交通便捷程度、区域劳动力增长、外部投资等 4 个变量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较好地支撑了该论点。

城市群核心城市之间之所以会产生“积极竞争，消极合作”行为，其根本原因在于现有的官员考核与选拔体制。当城市群核心城市之间存在竞争行为时，通过提高努力水平、主动出击，一方面可以促进本城市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可以削弱对方经济发展潜力，从而进一步提高本城市官员晋升的概率，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其潜在含义是“我得即你失”；当城市群核心城市之间存在合作行为时，为促进自身经济增长，这些城市可以进行一定合作，但随着这些行为对其他城市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增强，城市之间合作意愿随之降低。因为在本城市官员付出努力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对方也因此获得了增长，其潜在含义是“我得，同时你也得”，在取决于相对位置的晋升博弈中意义不大，这些城市都更愿意对方多付出，自己“搭便车”，乐享其成，便形成了现实中的“消极合作”态势。

因此，为了改变城市群内部“积极竞争，消极合作”的现状，我们认为至少应该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所调整：一方面，提倡区域错位发展，以北京与天津为例，随着北京城市定位的改变，经济职能的淡化，北京与天津的竞争关系开始逐步缓解，区域发展更加协调；另一方面改革现有官员选拔体制，改变“唯 GDP 论”，逐步将民生、生态等指标纳入到考核体系，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最终使城市群内部形成“积极合作，良性竞争”的良好局面。

10.传统方法测度的环境技术效率低估了环境治理效率？——来自基于网络 DEA 的方向性环境距离函数方法分析中国省级工业数据的证据

涂正革 谌仁俊（华中师范大学）

《传统环境技术效率低估了环境治理效率？》，《经济评论》2013 年第 5 期

工业技术效率的测度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研究的活跃领域，伴随着当前能源与环境问题日益恶化，人们开始考虑环境污染因素，并将其称为环境技术效率。环境技术效率，即评价生产者（或决策单元）在给定投入和技术条件下，同时追求最大产出和最小污染的效率大小。实质上，它是生产效率和环境治理效率的综合结果。其中，生产效率是在不考虑污染排放因素下，所计算出的技术效率。环境治理效率是在将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排放和污染治理投资等作为投入，将污染治理量作为产出，所计算出的技术效率。所以，计算环境技术效率，不仅

要充分考虑到评价产出最大化的生产效率,而且要兼顾评价污染最小化的环境治理效率。准确计算工业环境技术效率意义重大。如果把工业环境技术效率作为考察环境、资源与工业增长协调性的评价指标(涂正革,2008),那么一旦低估了生产效率,未免会造成因“过度”重视环境治理而损失过多的经济增长的代价,相应苛刻的环境政策导致过高代价对发展中国家难以承受。另一方面,如果低估了环境治理效率,势必会降低生产者对环境治理的积极性,松懈地方政府对环境治理的监管力度,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那么,环境治理效率,这一近年来才被强调的问题,是否被现在普遍所采用的环境技术效率计算方法充分考虑?

法尔等(2011)发现环境技术的传统定义均存在一个“黑箱”问题,即将要素资源投入到技术中,然后“好”产出(即正常产出)与“坏”产出(即污染物,如 SO_2)从技术的另一头生产出来。一旦将工业生产过程分为好产品的生产、污染物的治理两环节,基于网络 DEA 的方向性环境距离函数方法,其计算结果将与传统 DEA 方法存在较大差异。我们猜想这一差异源于传统方法低估了环境治理效率。为了验证这一猜想,我们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进行验证。

理论分析方面,网络 DEA 模型强调污染净排放量(即生产环节污染排放量)的减少,而 DEA 模型强调污染终端排放量(即环境治理环节未处理掉的污染排放量)的减少。所以,网络 DEA 模型在计算工业环境技术效率时,更为准确地涵盖了环境治理效率,而 DEA 模型则有可能低估了环境治理效率。

实证检验方面,我们先通过非参数检验方法,再从全国和地区、静态和动态等角度对这两种方法测度的结果进行差异性比较分析,均发现存在显著差异,传统方法测度的环境技术效率低估了环境治理效率。进一步,以网络 DEA 方法测度的环境技术效率为被解释变量,以环境治理效率为解释变量,以传统 DEA 方法测度的环境技术效率为控制变量,建立双边面板 Tobit 模型,发现环境治理效率对网络 DEA 方法测度的环境技术效率有显著的正效应,这再次说明传统方法低估了环境治理效率。传统方法测度的环境技术效率低估了环境治理效率,造成了严重的偏差,江西、甘肃、云南、重庆和广西等环境治理效率较高的地区,就因此被错误地划分到了环境工业不协调发展地区,这对于政策的制定极为不利。

11. 环境规制是否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

李强(安徽科技学院、南京大学)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基于 Baumol 模型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经济评论》2013 年第 5 期

产业结构调整是我国“十二五”规划和“十八大”提出来的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我国经济经历了 30 多年的快速发展,工业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但背后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为了解决经济发展和环境之间的矛盾,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关环境保护的环境法律法规,不断

提高环境规制的强度。同时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实现三大产业之间及其内部关系协调和升级。要继续加强第一产业,巩固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提升第二产业,增强第二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让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三大产业的产值和劳动力比例由目前的“二、三、一”结构调整调整为“三、二、一”结构。而且从十八大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之中,作为优化产业结构的基本要求。以破解能源资源约束和缓解生态环境压力为出发点,树立设计开发生态化、生产过程清洁化、资源利用高效化、环境影响最小化的理念,加快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业。加大节能降耗力度,严格能耗物耗准入门槛,推广重点节能技术、设备和产品,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推行清洁生产和污染治理,加强低碳技术研发和推广,逐步削减重点行业污染物排放量,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治,促进污染末端治理向源头预防、过程控制并重转变。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再制造产业,建立完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探索合同能源管理、节能自愿协议、碳交易、排污权交易等新机制新模式,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那么这些环境保护和规制措施是否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为了更好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推进环境保护与产业结构调整协调融合,如何去积极应对环境规制的这种影响呢?我们通过建立一个含有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模型研究认为,环境规制的存在会提高服务业部门相对于工业部门的比重,从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而且通过我国 2002-2011 年的分地区数据证实了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同时数据实证分析还认为不同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差异,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最强的促进作用,其次是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工业污染源治理在这三种方式中效应是最小的。

鉴于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各地应有意识地推出有利于区域创新的政策,利用好市场激励型的环境规制手段,为潜在的区域创新能力提供驱动力。另一方面,需要改善对本区域企业参与环境规制的评价体系,以实现科学合理地引导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而且要加大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同时政府进一步实施费用型环境规制措施,为创新激励效应的发挥提供良好的环境,促使企业积极改造生产过程。适当增加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能够增加该地区的研发投入,促进其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政府在提高规制强度的同时,要给予企业适当的创新补贴,例如税收优惠等政策。

12. 社会资本对中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的影响

马宏(中南民族大学)、汪洪波(香港科技大学),《经济评论》2013年第5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总体上不断扩大,基尼系数不断攀升,超过了国际

公认警戒线 0.4。不断扩大的居民收入差距所导致各种负面效应日渐显露，亦成为当前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

20 世纪 70 年代麦金农 (McKinnon) 和肖 (Shaw) 指出，金融自由化改革与发展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但在中国转型经济时期，金融发展主要有利于富人和具有某种政治联系的企业，尤其是正规金融机构未能向穷人和民营中小企业等弱势群体提供同等的金融服务。其结果是金融发展反而使得社会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金融市场体系除了正规金融部门以外，通常还包括一定规模的非正规金融部门。非正规金融发展同样对于收入分配也存在不可小觑的影响：一方面，非正规金融可以为弱势群体提供融资支持，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从而发挥缩小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非正规金融的不规范发展，往往带来高利贷、金融风险以及对正规金融的资金吸出效应等负面影响，从而阻碍正常经济增长，扰乱社会秩序，导致经济资源分配不公，最终不利于居民收入分配的改善。现阶段，中国的非正规金融发展存在诸多不规范之处，其对于收入分配的不利影响亦十分明显。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关注和强调社会资本在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研究中的重要角色。这里所指的社会资本是指通过行为个体间或组织间交往联系所形成的社会网络、信任与规范来获取资源并由此获益的能力。中国素以其“关系社会”的特质而闻名。在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网络、关系、信任、合作等非正式制度往往充当了正式制度的替代品，能弥补市场制度发展的不完善，在经济和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考虑社会资本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

社会资本可以通过社会关系网络、人际之间的信任和互惠规范等非正式约束机制作用的发挥，增强人们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关系，减少机会主义倾向，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提高金融交易的效率，促进金融发展。在非正规金融市场，社会资本(例如网络关系、信任等)的角色更为重要。缺乏抵押资产或担保的私营业主与农户等主要利用私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保障信贷合同的可执行性，从而获取相应的金融服务。由于非正规金融的参与主体主要是弱势群体，而社会资本能够帮助他们通过非正规金融获取资金从而增加收入，因此社会资本总体上降低了非正规金融对收入分配的不利影响。尤其是在制度不完善的地区，社会普遍信任水平很低的情况下，社会资本对于非正规金融收入分配效应的改善作用越强。而在正规金融市场，由于金融发展的服务对象不是弱势群体，其对社会资本的依赖比较小，因此社会资本的影响相对不明显。

因此我们建议，为了改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政府有必要加大对社会资本的投资力度，提高公民素质教育，并创造条件鼓励民间组织和社区发展，提升社会资本整体水平。同时也要进一步深化金融发展，大力发展新型微型金融组织（如小额贷款公司、社区银行、乡镇银行、合作金融等）服务弱势群体，改善正规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另外也要规范非正规金融发展，培育社会资本和非正规金融发展的良好环境，适当发挥社会资本在非正规金融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降低其对收入分配的不利影响。

13. 非线性利率规则和中国经济波动

郭宁 (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评论》2013 年第 5 期

货币政策规则是中央银行在经济环境约束下追求货币政策目标最优化的结果,不同的经济环境和政策目标会产生不同的货币政策规则,因此,为分析货币政策,需要从具体经济环境和政策目标出发。然而,传统的货币政策分析通常以线性——二次经济模型为基础,即货币当局的目标函数是二次函数,经济结构是一个线性方程组。线性——二次经济模型是规范分析的出发点,若实证分析同样以此为出发点,则会掩盖不同国家经济环境和政策目标的差异。建立在线性——二次经济模型基础上的货币政策规则是线性的,即对于产出和通货膨胀与其目标值的正向和负向偏离,货币政策的反应是对称的。线性货币政策规则无法反映具体经济环境和政策目标的不同特征,为进行最优货币政策规则设计,必须突破线性货币政策规则及其线性——二次经济框架的约束。

通过建立一个包括一般的中央银行目标函数和经济结构的模型,可以检验我国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的非线性特征。具体而言,中央银行目标函数允许中央银行对实际产出以及通货膨胀与其目标值不同方向的偏离具有不同偏好,非线性的总供给曲线也允许通货膨胀对经济扩张和收缩表现出不同反应。通过推导我国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并进行参数估计,结果显示,我国中央银行对实际产出以及通货膨胀与其目标值不同方向的偏离都表现出非对称性。中央银行在产出收缩时的反应要大于产出扩张时的反应,表现出对产出扩张更大的偏好。就通货膨胀而言,我国中央银行不是一个强烈的反通货膨胀者,更倾向于反通货紧缩,表现出对通货紧缩比对通货膨胀更大的厌恶,这一偏好和对产出扩张的偏好是一致的。我国的总供给曲线同样具有非线性特征,它为我国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引入一个独立的非线性来源。具体而言,我国的总供给曲线是凸的,随着实际产出与其目标值正向偏离的增加,通货膨胀上升的速度越来越快。所以,随着经济扩张,关注经济稳定的中央银行面对的通货膨胀压力会大幅度增加。而当经济萧条时,通货膨胀并不会随产出收缩直线下降,而是下降速度越来越慢。

综合上述分析结果,可以将我国中央银行的行为概括如下:虽然中央银行以通货膨胀稳定和经济稳定增长作为货币政策目标,但由于不同方向的通货膨胀缺口和产出缺口的边际成本不同,相对于产出收缩和通货紧缩来说,我国中央银行更偏好于产出扩张和通货膨胀。实践中,由于货币政策作用存在“长而可变”的滞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制定通常建立在对经济状态的预期上,而不是建立在实际经济状态上。面对不确定的未来经济状态和对经济扩张的谨慎需求,中央银行在制定政策时,就会使犯紧缩错误的概率小于犯扩张错误的概率,从而倾向于频繁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结果不但是产出暂时的扩张,而且伴随着高通货膨胀。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尚低,人民存在着巨大的尚未满足的需求,较大的货币供给适应了这一需求,为这一需求的满足提供了手段。但同时,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也是生产能力较低的结果,不断提高的需求必然受到供给不足的限制和生产瓶颈约束,结果是随着经济扩张,凸性总供给曲线使得通货膨胀以更快速度上升,最终使得中央银行被迫进行货币政策调整,从

而使我国货币政策进入一个扩张和收缩交替不断的怪圈，人为地造成了经济不稳定。因此，为走出这一怪圈，避免人为地增加经济波动，必须改变中央银行偏好，转变中央银行目标，认识到我国的主要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生产能力低下，提高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必须依靠提高我国的生产力，而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恰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

14.为什么消费者对同一种货币政策有不同的反应？

柳阳（大连银行、大连理工大学）

《我国货币政策的消费需求非线性效应的实证研究》，《经济评论》2013年第5期

消费者对同一种货币政策有不同的反应，这句话实际上包含了两种情况，一是同一位消费者在不同时期对同一种货币政策有不同的反应；二是在同一时期不同的消费者对货币政策有不同的反应。

对于以上列出的这两种情况，各位读者即使没有任何数据或理论的支持，只是想想自己和身边的亲戚朋友面对利率调整或者存款准备金调整时所采取的行动，也能够发现这两种情况曾经发生过。有时候利率上调，您可能会选择减少一些消费，把手头多余的现金拿去银行存起来，以期赚得利息；但是也有时候您手头并没有闲钱，又或者有必要的消费需求，那么您对利率无动于衷，也是非常正常的。也就是说，利率或者其他任何一种货币政策工具对消费者能够产生的影响都是间接的，它们实际上只是一个标价的作用。在紧缩的货币政策时期，利率的上升使消费者意识到自己手中的现金或存款变得相对更“贵”了，相反在宽松的货币政策时期，消费者也知道自己的钱“不值钱”了。这种货币与商品之间相对价格的变化，只是影响消费行为的众多因素中的一个。真正能够从源头上控制消费行为的是消费者的收入约束。

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速度分别从能力和预期两个方面影响消费行为。假设 A 消费者的收入水平较低，B 消费者的收入水平较高，收入增长速度却几乎为零，C 消费者的收入水平与 B 相似，但是收入增长速度很快。这三位消费者在面对同一种货币政策时会有相同的反应吗？A 消费者的收入较低，可能只够满足日常必需品的消费，手里的闲散资金不会太多，而且由于收入低，必须还要为一些突发事件预留出足够的预防性储蓄，他对货币政策的反应会相对迟钝一些。B 消费者收入水平较高，那么可能他的消费水平要高于 A 消费者，但由于预期到未来收入不会增长，所以在进行大额信贷消费时会比较谨慎，不会仅仅因为利率下调就购买高价的房产或汽车。A 和 B 消费者虽然收入水平不同，但是收入增长速度都很低，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对他们的影响能力较小。C 消费者由于收入增长速度快，预期自己未来的收入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就会有提前消费的心理，将未来的消费效用平滑到现在。这时存贷款利率的变动或授信额度的变化，对他都会产生明显的影响。因此，货币政策在收入增长速度高时效果更为显著。

以上的分析是从微观个体的角度出发的，如果更进一步将这些微观个体加总，我们就会看到整个社会上由于收入分配和收入增长差异所导致的货币政策反应不一致的情况。我们能够发现西部一些城市的收入和消费就如同 A 消费者一样，中部如 B 消费者，而东部沿海地区则如 C 消费者。在进行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时，这些地区间自然会出现不同的反应。又或者我们沿着时间轴来看，有一些城市在过去的某个时间段内收入增长水平高，而近期收入增长缓慢，在这两个时间段内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同样会不一致。

意识到这个现象的存在，对于货币政策实现它的调控目标有着重要的意义。当一项货币政策措施出台后，消费需求毫无变化时，与其继续出台一项类似的货币政策措施，不如从提高收入增长的角度去制定其他的措施，也许可以实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

15. 场外衍生品业务对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不容忽视

斯文（上海社会科学院）

《关于衍生品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研究——基于我国上市银行的经验证据》，《经济评论》2013 年第 5 期

2013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需要加强对金融机构表外业务风险的监管，而商业银行从事的场外衍生品业务就属于典型的表外业务，其风险效应却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2005 年 6 月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推出债券远期交易，诞生了首款场外衍生品合约，拉开了国内银行从事场外衍生品业务的序幕。随后，外汇远期、利率互换、人民币外汇掉期、远期利率协议、人民币外汇期权以及信用风险缓释凭证等场外合约相继推出，银行参与衍生品合约交易的品种不断扩大。根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统计，2012 年我国场外利率衍生品、汇率衍生品交易的名义本金规模高达 2.92 万亿元和 2.58 万亿美元，是 2006 年的 29 倍和 40 倍。

银行是场外衍生品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往往拥有多重的交易动机。一是作为套期保值者，利用衍生品对冲自身面临的利率、汇率、信用等金融风险，从而降低相关风险的暴露，在提高对风险承受能力的同时，却可能增加银行从事更高风险业务的意愿和冲动；二是扮演做市商角色，持续向市场报出衍生品合约的买卖价格，在为市场提供流动性的同时，也扩大了中间业务收入，但银行自身需承担潜在的流动性风险；三是依托专业和人才的优势，基于对利率、汇率、信用利差趋势的研判，从事套利、投机为目的的衍生品交易，同时向客户提供金融风险管理服务，进而改善银行盈利结构，但可能增大银行风险暴露程度。

著名投资大师沃伦·巴菲特曾告诫投资者“衍生品是金融领域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全球知名的金融机构摩根大通银行 2012 年 5 月对外披露因投机信用衍生品合约而造成最高达 90 亿美元的巨额亏损，这也成为近年来金融机构因不当使用衍生工具而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典型案列。而通过对我国 16 家上市商业银行 2006-2012 年间的半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场外衍生品业务对银行风险产生了显著的正效应，这与国外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是一

致的。就效应规模而言，当商业银行持有的场外衍生品占信贷余额的比例提高 1%，不良贷款率将上升 0.022%，贷款损失准备占贷款总额的比重也将提高 0.013%。

对此提出如下两点政策建议：一是加强对银行衍生品业务的监管。随着我国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未来国内利率、汇率的波动会进一步加大，银行的衍生品业务也将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得到长足发展，特别是 2013 年 9 月 6 日国债期货业务的重新开闸，众多国内银行正跃跃欲试。由于衍生品业务会提高银行风险水平，因此建议我国央行和银监会在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下，将整体衍生品、单一衍生品的名义本金占总信贷的比率作为新的监测指标，动态计量和监控衍生品业务对银行风险的影响，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二是重新审视衍生品业务发展战略。当前国内银行正在大力发展衍生产品等创新业务和表外业务，期望借此改变以信贷业务为主导的传统发展模式，优化盈利结构，降低信贷风险。然而，这种业务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增大银行的风险，银行管理层很有必要重新审视现有的衍生品业务发展战略，全面分析衍生品对银行风险的内在传导机制，审慎、稳步和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类衍生品活动，防范此类业务的高速扩张而间接加大自身风险，从而有效提升银行经营的稳健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

理论前沿动态

16. 演化经济学还是异端经济学吗？

于斌斌（东南大学）

《演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发展：一个文献综述》，《经济评论》2013 年第 5 期

通过对 Econlit 数据库过去 50 年的统计发现，90% 的有关演化的经济学文献是在 1990 年以后发表的；而在中国期刊数据库中，截止 2012 年底，关于演化经济学 90% 的研究文献是在 2005 年以后发表的。在过去 30 年里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后，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过分追求形式逻辑的均衡分析范式远离现实，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而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迅速，相关研究主题也越来越多。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经济学正在从“均衡”范式走向“演化”范式，经济学理论即将迎来“第三次分叉”。

演化经济能在近 30 年的时间内迅速兴起，主要在于三个方面的原因：（1）主流经济学均衡分析存在重大的范式危机，主要因为其以机械论和简单论的方法论基础，且以静态比较方法为主，严重偏离现实；（2）耗散结构理论、量子力学理论、混沌理论、综合进化论、演化博弈论等自然科学理论的兴起和发展，否定了主流经济学理论中隐含的经济过程可逆和线性系统的假设，认为经济系统的不确定性因素可能会被放大甚至可以影响整个经济发展方向，是不可以忽略的，而且这些理论为演化经济学提供了很多可以使用的语言和理论灵感；（3）从马克思、凡勃伦、熊彼特、哈耶克等大家的理论中都渗透着演化的思想，成为了演化经济学发展的思想来源。与此同时，演化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假设进行了批判和超越，典型的有：（1）主流经济学重视平衡状态的研究，忽视了达到均衡的过程，而演化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演化过程，主张用“演化”替代“均衡”；（2）随机因素对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行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企业决策和创新过程中，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使企业在长期难以实现最优化决策，而有限理性和完全理性、满意与最优是演化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理论假设的重要反叛和超越；（3）演化经济学将个人选择置于群体的多样化行为之中，更加强调个人行为的异质性和主观偏好的特质性对“新奇”创生和创新过程的重要性，主张用“多样性”代替“同质性”。

如果主流经济学是研究存在（being）的经济学，那么演化经济学就是研究生成（becoming）的经济学，是对经济系统的创生、变异、扩散和结构演变进行研究的科学。因此，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具备三个最基本的特征：（1）理论研究的是一个经济系统的动态过程或解释这一系统为何或如何达到某一状态；（2）理论解释既包括随机因素又具有选择机制，而演化结构既具有不确定性，又带有因果关系；（3）通过选择机制生存下来的特征具有一定惯性，可以观察很多变量在相对较长时间内的运动轨迹和模式。即便如此，演化经济学

尚有很多困境难以突破，如缺乏一个系统的、一致的分析范式和严格的数理模型；侧重哲学思辨性而缺乏实证检验性；缺乏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和新的理论工具等。这些困境也是任何一种新理论在诞生之初的通病。但是，演化经济学对经济学的影响不在于能否替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而是预示着经济学多元化范式的到来。这意味着经济学将“复活”长期被压制的信仰、文化、制度、心理、道德等因素应有的理论地位，将理性分析与历史分析、制度分析和心理分析相结合。演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交锋，实际上是“人文”经济学和“科学”经济学的碰撞。纵观我国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 30 年一次演化：从改革开放前 30 年照搬“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到改革开放后 30 年大量引入“西方模式”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接下来 30 年，我们应该构建适合自己国家经济发展的“经济学科体系”或者叫“中国经济学”。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既有问题等特殊背景，再加上中国经济学界尚未形成“一元化”格局，中国有可能会成为演化经济学研究的中心，我们也将拭目以待。

17. 小企业贷款难的“愁”与“解”

黄宪 曾冉（武汉大学）

《微金融理论研究的发展》，《经济评论》2013 年第 5 期

我们在庆贺酒会上常常见到香槟塔，众多香槟杯由下而上逐层数量递减垒成一个塔型结构，再从顶端开始倒香槟。最先得到香槟的永远是最高层的香槟杯，在这种“香槟塔效应”中最引人瞩目的永远是塔尖，而企业的信贷市场也有类似的现象。在企业融资可获得性的排序中，大型企业一直是银行追捧的宠儿，香槟塔底层的小型 and 微型企业是最卑微的，而这一现象在中国尤为突出。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小微企业融资如此受银行歧视呢？是企业自身的原因还是银行业的问题呢？关于这个问题微金融经济学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小微企业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信息或者通俗认为贷款条件的特殊性上，它不似于大型企业能够提供抵押担保，具有长期与银行往来形成的信用等“硬条件”。正是由于其信息不透明、财务管理不规范、数据可信赖度低及缺乏抵押品和担保等特点使得建立在以抵押担保等为基础而设计的业务运行和风险控制模式的大银行很难在持续盈利状态下参与对小微企业的贷款。由于大型银行对借款者的信息偏好和处理信息内在机制和系统与小额借款者信息特征的严重不匹配，造成以大银行为主导的银行体系在贷款上天然“歧视小企业”，这是小企业融资难现象普遍存在的根本原因。

然而，对风险和盈利机会理解理念的差异，以及独特的业务运行、风险控制机制和模式，使得小型金融机构在处理、量化以及传输这类不透明信息的技术和能力上具有独特优势。首先，小型金融机构一般具有本地草根性的特点，将会为金融机构与本地潜在借款者日常往来与相互了解提供基础。随着相互了解的加深，金融机构更容易和借款者形成长期稳定的“关系”，这不仅意味着便利的信息获取与个人了解，还降低了道德风险与监督的成本。其次，小型金融机构具有更加“简单”的组织结构，意味着从小微企业信息的获取到决策只有很短的

传递链，缓解了这类“难以传达”的信息传递和处理的困难。简单地说，草根性及组织机构等特点将使得小型金融机构在小微企业信息获取、传递与处理上获得竞争优势，而这种竞争优势将使其获得一定垄断地位，保证了小型金融机构的生存与抗风险能力。

尽管来看，小型金融机构对不透明信息技术处理的比较优势使得它们在贷款领域里有着自己相对稳定的市场范围。然而，市场范围的划分永远是相对的和变化的。随着金融监管的放松、信息技术的进步和竞争的加剧，银行业之间业务的相互交叉渗透成为趋势。然而微金融经济学一般认为，这种交叉渗透会改变银行间的市场范围，但由于银行自身在经营理念、组织结构、风险控制等方面的不同特点将限制这种改变的幅度，小型金融机构在小微企业融资业务的核心竞争力依然存在。换句话说，环境的变化带来的只是市场范围的“量变”，而不会引起“质变”。

总的来说，小型金融机构比大型商业银行更适合承担对小微企业进行融资的作用。小企业信息不透明并不是“小企业贷款难”的主要原因，而是我国银行业以大型商业银行为主导的必然结果。推动小型金融机构发展，改善银行业市场结构是解决“小企业贷款难”问题的根本途径。

18. 货币政策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评述

廉永辉 张琳（南开大学），《经济评论》2013年第5期

众所周知，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管在哪，通胀都始终是一种货币现象”），而且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影响就业和经济增长，此次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量化宽松正是寄希望于此。然而，货币政策在被中央银行用于干预经济系统运行时，是不是还产生了一些意料之外的“副作用”？如果有，中央银行是否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应对？答案是肯定的。研究表明，货币政策的一大“副作用”就在于其能够影响经济不平等。经济不平等即经济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从流量角度看，它就是大家经常耳熟能详的收入不平等；但实际上，更为重要的不平等恰恰是存量意义上的不平等，即财富的不平等。

康比恩（Coibion）等人通过对美国经济不平等衍化的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在经济不平等问题上并非是“无辜的旁观者”，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是导致美国经济不平等上升的原因之一。但是，货币政策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并没有明确的答案。理论上，货币政策至少可以通过五种途径影响经济不平等。一方面，从“价格-实际二分法”的角度看，价格变量和实际变量在货币政策作用于经济不平等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应有所不同；另一方面，从时间维度上看，长期和短期内货币政策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机制也不尽相同。除此之外，货币政策实施本身的动态特征，尤其是货币政策的过程性和对经济运行的非对称影响也能作用于经济不平等。

以扩张性货币政策为例分析货币政策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第一，长期内货币扩张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的方向不明确。第二，短期内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影响诸如就业率和就业结构

而改变经济不平等程度。第三,考虑到人与人、家庭与家庭之间财富存量和财富结构的不同,扩张货币政策可以通过私人债权债务再分配渠道、通货膨胀税渠道和资产价格渠道影响财富不平等。第四,正如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米塞斯(Mises)和罗斯巴德(Rothbard)所指出的,现实中货币政策扩张非如“直升机撒钱”那样均匀地、直接地增加所有个人持有的货币余额,而是经过一个多阶段的过程才能最终影响整个经济系统中的所有参与者。由于首先获得新供给货币的主要是那些信用状况较好的、较多参与金融市场的企业或个体,而这些企业或个体已经具有较多的资金财富,这就造成了一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即扩张性货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扩大了经济不平等。此外,也有研究表明,虽然短期内货币扩张导致的产出增加有利于提高穷人收入并降低经济不平等程度,但其后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从相反的方向以更大的幅度增加了经济不平等。这种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导致了经济不平等程度在货币政策扩张和紧缩的交替实施过程中逐渐累积。

在思考货币政策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时,不同的影响渠道对应的结果迥异。相应地,在“中央银行是否应该使用货币政策来缩小经济不平等”这一问题上,有两派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派观点如马丁·费尔德斯坦(M Feldstein)认为,货币政策不适用于应对收入不平等问题和与之相关的贫困问题。而托尔贝克(Thorbecke)等则认为在通货膨胀较为平稳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应该敢于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进一步降低失业水平,从而减弱经济不平等。此外还有一种较为折中的观点,即:一方面承认货币政策能够用来缩小经济不平等,另一方面认为货币政策不适于应对收入分配问题。如格林斯潘(Greenspan)等指出既然扩张性货币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收入不平等或财富不平等,那么货币政策最好以“稳定”为导向,即致力于平滑经济周期、减小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和减小通货膨胀波动率,在稳定的经济环境中达到稳定、效率和公平三大目标的共同实现。由此可见,货币政策能够影响经济不平等,但其影响机制和后果尚待进一步分析,货币政策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经济评论》简介

《经济评论》是由教育部主管、武汉大学主办的经济学术期刊，创刊于 1980 年，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人。本刊坚持“让思想引领学术、以学术砥砺思想”的基本理念，立足于中国经济实践，瞄准当代世界经济理论前沿，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现代化、本土化和规范化。本刊设有中国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研究、经济理论探索、理论前沿动态等栏目，发表经济学领域各类学术规范、方法现代、研究深入且具原创性的学术论文和评论文章。

《经济评论》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CSSCI 来源期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2012 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精品期刊。

据中国知网统计，本刊的机构用户分布在 27 个国家和地区，如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个人读者分布在 28 个国家和地区。每年都有大量论文被《新华文摘》、《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文摘》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各种期刊等众多报刊文摘转载和转摘。

在最新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全国 69 种经济学理论核心期刊中，《经济评论》排名第 4；在最新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全国 25 种综合性经济学专业核心期刊中，《经济评论》位居第 5；在《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报告（2012 版）》中，《经济评论》被评为“2012 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在全国 34 种（Top5%）人文社会科学类“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中排名第 12。

作者可以进入本刊网站（<http://jer.whu.edu.cn>）网上投稿审稿系统在线投稿。根据相关提示操作，即可完成注册、投稿。完成投稿后，还可以通过“作者中心”在线查询稿件处理状态。本刊不收取版面费、审稿费等任何费用。

主管：教育部

主办：武汉大学

编辑出版：《经济评论》编辑部

简报责任编辑：杨丽艳

联系电话：027-68754563

E-mail: whujer@163.com
